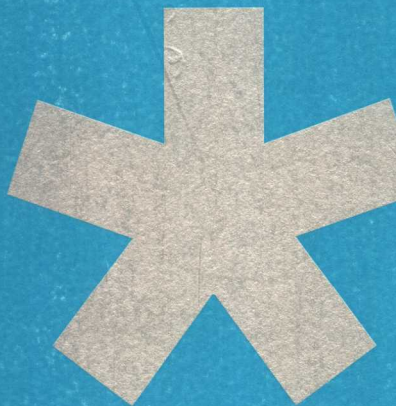


世界 > the World

传统与 对外关系

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



作者对西方中心论在西方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批判，并同时论证了中国传统价值在处理国际问题方面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相蓝欣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传统与 对外关系

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

相蓝欣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 / 相蓝欣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8

(世界丛书)

ISBN 978 - 7 - 108 - 02660 - 6

I. 传… II. 相… III. 中美关系 - 研究 IV. 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5166 号

责任编辑 薛松奎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5.5

字 数 116 千字

印 数 00,001 - 10,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前言

别人的书越写越长，我的这本书却越写越短。花了整整六年工夫，却勉强得到 10 万字。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有言，当你讲不清楚一个问题时，最好是保持沉默。但我还未能达到维特根斯坦的境界，仍然是不甘寂寞，自认为还有东西要说。

这个题目从我完成《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一书以后就开始了。一百多年前的义和团战争给我一个很大的刺激。据我所掌握的中外史料，这场战争的起源与中外领导人之间的沟通有至关重要的联系。特别是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运作方式不能、也不愿理解。根源之一是 19 世纪以来在西方形成的欧洲中心史观造成的思维定势和体制优越感。

2003 年，这个研究项目被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克鲁基中心看中，邀请我做了第三任亨利·基辛格讲座教授。在那里同基辛格博士本人和一大批专家学者及政策制定人就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在我看来，美国是一个讲求实际、不拘泥守旧的国家。中美关系的最大症结并不在于国际关系理论所说的实力冲突。美国朝野对中国最不放心的是政治体制。

这个关键之点一旦想通，一通百通。

中国政治改革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什么美国人视而不见呢？原因是没有按照他们的思路走。这是多年来形成的体制优越感的必然结果。因此，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同他们正面交流是十分紧迫的任务。目前国内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点却在寻找“价值中立”的外交口号，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处于被动局面。应当认识到，中美关系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如果不能拉近距离，任何“和平崛起”的口号都将无济于事。

按照现行的学科分类来看，这本小书算不上是规范的著作。说得好听一点是“跨学科”，难听一点就是“杂说”。本书涉及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的一些基本问题，写作的最大障碍不在“理”，而在“词”；可以说理虽未必屈，词穷是肯定的。维特根斯坦在写作《哲学逻辑论》时也非常艰难，因为他既然要推翻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就不能用规范的传统哲学语言。最后干脆用数字来排列他的逻辑思考。我的问题与他不同，面临的对手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引进的大量外来词和移植词，特别是将汉语的大量词汇偷换为西方的本体论、目的论或两者兼有的“关键词”陷阱。所以左冲右突，处处设防，积六年之功只得这点文字。至于不得不使用的移植词，只好加上西语原词，以便表明它不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本土语言。我在西方出版过三本学术专著，用英文写作似乎更加容易。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思路反而成了苦不堪言的一件事情。

这本书的初衷是对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即双方政治见解的分歧进行探讨。后来发现，只有对中西传统的一些基本问题

进行尼采式、而不是康德式的批评 (critique)，才能避开移植词陷阱——即在西方话语霸权的桎梏下讨论中美关系。2005 年 9 月，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在纽约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政策演说，其中最具新意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应该促使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 stakeholder。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问题是：弄清美国人要让中国做一个怎样“负责任的 stakeholder”？首先，我们得准确地翻译什么是 stakeholder。这个概念在中国并不常用。它的英文原义是“赌金保管人”，法语中对应的词 *dépositaire* 也是类似“保管人”的意思；德语称 *der Verwahrer der Wetteinsätze*，含义也相似。日语的翻译是“利害関係者”。佐立克讲话之后，国内不少学者喜形于色，以为美国新保守主义从此寿终正寝，小布什政府又回到了“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朋友论”也开始大行其道。他们对 stakeholder 做了多种翻译和解读，包括“利益相关者”、“共同经营者”、“合伙人”等，强调这个词的“平等”感觉。

那么，美国是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与中国地位平等的 stakeholder 呢？抑或，它仍旧自居整个赌场的大老板？美国当然是后者。对此，国内有学者解释说，美国的实力比中国要大得多，它不会把自己视为和中国平起平坐的 stakeholder，因为美国人没有办法“克服固有的优势心理”。

其实，美国的优势心态不仅仅源于其经济实力。略通历史的人都明白，一国的经济优势是某个历史阶段的暂时现象。没有人能够让这个现象永远维持下去。而美国优势心理的根本源头在于意识形态，即 19 世纪以来欧洲所创造的西方中心论的全

方位优势感。在这一点上，佐立克和新保守派之间并没有根本区别，只是策略上有所不同。当中美关系出现危机，意识形态的优越感将轻而易举地占上风，成为对华政策的主要依据。因此，在中美关系上未雨绸缪，就不可避免地要正面接触意识形态问题，以“冷战思维”一言以蔽之终究不是战略思维的优秀表现，更谈不上是化解这种内在冲突的积极方法。

作者简介

相蓝欣，1956年4月生于南京，祖籍北京市，清代汉军镶蓝旗后裔。1974年2月至1978年2月在安徽淮北郭庄大队插队。后作为77级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1983年1月赴美留学，在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美欧问题专家戴维·卡莱欧教授。毕业后曾在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一年，并应耶鲁大学保罗·肯尼迪教授之邀担任国际军事战略问题高级研究员。1991年开始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克雷门森大学政治系任助理教授，1995年晋升副教授。1996年至今，在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任终身教授，兼中国政策研究中心主任。1997—2003年兼任罗马北大西洋公约防务学院将校班客座教授。2003—2004年获选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亨利·基辛格讲座教授，研究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曾出版英文著作三部：《重建帝国主义远东——英美对华政策，1945—1950》（美国夏普公司1995年）、《毛泽东的将军们——陈毅与新四军》（美国大学出版社1998年）和《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英国泰勒公司2003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同年出了该书的中文版）。曾翻译《凯恩斯传》（三联书店2006年）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报告：大趋势——2020年的世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此外还在美国《华盛顿邮报》、英国的《生存》杂志和《现代史期刊》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国际问题评论和学术文章。2006年2月开始，同美国国情委联合主办一年两次的“欧—美—亚三边高层论坛”。2007年起任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和外交学院特聘客座教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落后与挨打”的悖论	1
为何重新启动意识形态问题?	1
国际关系的语境	11
“落后与挨打”的关系	18
“旧体新用”与体制改革	25
“旧体新用”与中美关系	32
第二章 “历史哲学”的终结	41
“现代”概念的暗藏玄机	41
“历史哲学”的困境与出路	52
“天演”还是“进化”——理性主义的中式解读	62
“非理性主义”的误导	69
第三章 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	77
政治研究的方法	77

重建政治与历史的关系	86
时间与空间	94
政治实体——国家	100
“个人主义”辨析	104
自由与“自由主义”	111
所谓“法治”	118
 第四章 国际经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	 123
“经济发展”辨析	123
当代中国经济学与传统	130
“市场”与“消费”	142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	159
 结束语	 165

「落后与挨打」的悖论

第一章

为何重新启动意识形态问题？

落后与挨打究竟是什么关系？在近代以来的中国，这似乎从来不曾成为问题。事实上，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同时也是探讨如何同美国在意识形态上交手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的知识界自“五四”运动以来对它早已做出了结论，即两者在逻辑上是因果关系，在时间上是先后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据说一直是处于落后于西方的状态，后来终于挨打是势所必然。先有落后，后有挨打。这种观念直到今日仍然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但反过来看，如果落后就要挨打，那么，先进者是否就有打人的权利？如果说一国

在实力崛起之后就应当扩张领土，欺凌弱国，那么任何“和平崛起”的逻辑都不能让别人信服。难怪我们今天在讨论“和平崛起”或“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时仍然大大受制于落后与挨打的因果论。

摆正落后与挨打的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这对关系的现代诠释背后有意识形态的支撑。近代以来，长期主导中国知识精英思想的是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方中心论）。把落后与挨打看成是因果关系来源于欧洲中心论的直线历史阶段论和种族优劣论。如果中国融入世界的历史意义必将远远超出遵守现存的国际规则的价值范围，她就应当在国际政治领域里为世界做出意识形态方面的贡献。欧洲中心论的特点是重对立，轻和合。中国的传统思路强调“天人合一”，不接受任何截然对立、不可调和的关系。中国迫切需要自己的国际关系学派，在根本问题上摆脱“五四”运动以来的欧洲中心论的禁锢。但是，由于几代人“层累构造”的谬误，一切必须从源头上做起。尚且，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当世界迫切需要国际关系的新思路时，中国不能只关注经济上的国际纠纷，而不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拿出自己的看法。所以，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韬晦作风常常让外人感到不可理喻，反而有我行我素、不顾他人利益之嫌。

在落后与挨打的关系上的重新定位是中国人以正常心态，既无霸气，又无畏惧地进入世界体系的第一步。“五四”以来的因果论产生了三个严重的误导。第一，它假设中国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处于落后状态；第二，认定中国的唯一任务是全方位地赶超“先进”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制度；第三，赶超的同时也是脱胎换骨、舍弃自身落后的

文化传统的痛苦过程。如果我们把落后与挨打的关系倒过来考察，就会发现，中国长期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领先地位更加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即使在领先的辉煌时期，中国也没有出现把“打人”视为合情合理的、天降之大任的强权政治思路。中国在 19 世纪突然挨打是“打人文明”盛行并暂时领先的那个时代里发生的特殊事件。她先挨了打以后才开始探讨挨打的原因。种种证据表明，即使在鸦片战争发生时，中国的落后也是暂时现象，“赶超”应当只是一个阶段任务，没有任何理由成为与传统决裂的过程。此外，任何赶超的成功必须得益于对民族传统优势的阐发和利用。落后与挨打并没有因果关系。历史上的先进国家，比如普法战争中的法国或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国，都曾经挨了痛打。挨打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是，源于欧洲中心论的因果论却暗藏了玄机，因为它通常只被用来解释西方以外的国家为何挨打的现象，所以有很强的种族优劣论的意识形态背景。

但是，讨论落后与挨打这个问题的同时要重新启动意识形态问题。人们常常有一种习惯，把国际意识形态之争与存在区区 45 年的“东西方”冷战混为一谈。由于冷战的形式是双方在军事上的对峙，因此人们总以为意识形态之争必然会引起军事冲突。其实这是一种对历史的误读。冷战是国际关系史上的特例，而不是常例，因为它是被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均势状态所掩盖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争斗，实质的竞争仍然在传统因素，即经济、文化和政治上。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西方的冷战精英们就开始讨论意识形态的争斗在西方内部是否已经终结的问题。当时参加这场大辩论的著名学者有法国的雷蒙·阿

隆 (Raymond Aaron) 和美国的卡尔·曼海姆 (Karl Manheim)、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厄文·克利斯托 (Irving Kristol)、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亨利·爱肯 (Henry Aiken)、罗伯特·哈伯 (Robert Haber) 以及迈克尔·哈林顿 (Michael Harrington) 等。

通过这场辩论,出现了名噪一时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它的出笼基于以下两大前提:第一,由于在工业发达的国家里已经不存在 19 世纪的那种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政治行为,因此,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对现状的一种事实描述。此外,美国被认为是西方国家中意识形态终结的典范,因为这个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在政治和经济体制问题上达到了基本共识,即民主共和与市场经济并存。所以,同欧洲大陆相比,美国似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政治。第二,既然西方工业社会已经达到或接近“美好社会”的要求,因此,任何新的意识形态之争只能对它的继续进步起阻滞作用。参与辩论的学者几乎都赞成第一个前提,但是他们在第二个前提上分歧很大。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学者们对“意识形态”如何界定各持己见。他们提出的定义有七八种之多。阿隆认为:“意识形态……是对历史世界的总体看法的一种虚设的系统。”贝尔则称:“意识形态是将理念转化为社会杠杆的过程。”哈伯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描述社会的知识产品。”曼海姆却强调对意识形态应做“特殊”和“一般”的形式划分:特殊的意识形态有道义的层面,而一般的意识形态则是社会学的那种带普世意义的价值中立的知识。社会学家帕森斯的定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乃是

一套信念系统，被某个人类群体的成员共同认可。”爱肯则不敢苟同，认为“政治意识形态无非只是一种最规范的、带普遍意义的政治论述方式”。¹

当然，定义上的争论所反映的是这批著名学者的不同政治倾向和当时的国际政治大环境。他们对什么是“美好社会”的看法本来就大相径庭。比如，克利斯托后来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祖师爷，贝尔是自由派的旗手，阿隆是欧洲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巨擘，而曼海姆是研究乌托邦理论的顶级学者。意识形态终结的辩论到了60年代更加激烈。当时的国际背景中最突出的事件是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而不能自拔。有意思的是，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是反战派却拿不出任何激进的社会改革方案以防止越战这类事件的重复发生。这似乎证明了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第一个前提，即美国从来没有意识形态之争的基础。既然连这样一场规模宏大的反战、反政府运动也没有造成意识形态的大分歧，那么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这位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大师对美国的反战派嗤之以鼻的态度就可以理解了。凯南当时的一句名言是：“没有纲领的造反派只有一条出路，要么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要么就闭嘴。”

为了讨论的方便，本书将不采用政治和道德倾向浓厚的意识形态定义。汉语中本无“意识形态”一词，中国传统文化也很难接受任何涉及意识形态的讨论方式。既然这个词是外来语，我们还是采用该词

1 Chaim Waxman, *The End of Ideology Debat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8, pp.3—5.

(ideology) 随法语词根演变而来的原始意义。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有两层含义：其一，它是反映某个个人、团体、阶层或文化的社会需要和渴求的一套理念；其二，它是构成某种政治、经济或其他体制的基础的一套原则或信念。换句话说，它反映人的社会需要，同时也构成某种体制的理念基础。本书在探讨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的过程中对这两方面均要涉及。首先，国家间的关系同领导和决策人物的意识形态观念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比如说，一个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基础是某个宗教信仰，那么他的政策就会带有强烈的救世特点，以迫使他人皈依其教义为己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布什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倾向不可避免地会对他的外交政策产生极大的影响。可以说，美国新保守主义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联盟是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原动力，也是用枪杆子制造民主的所谓“布什主义” (Bush Doctrine) 的思想根源。

其次，作为体制基础的一套理念是根深蒂固的。美国从立国之初就开始形成傲视他人的体制优越感。在精神上，美国是“新耶路撒冷”，在经济、政治生活上是人间的乐园。作为世界上由各类移民建立的大国，“美国梦” (The American Dream) 是内在凝聚力的支撑点。所谓“美国梦”假设美国既是公平竞争和社会正义的象征，又是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大熔炉 (Melting Pot)。尽管事实与“美国梦”相去甚远，体制优越感是美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基本理念之一。

我们重新启动意识形态的辩论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首先，冷战中的那种人为的、以意识形态为标准的东西方的划分概念已经不复存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要回到早先那种以历史和文化源头为东西分野的时代。也就是说，冷战后的意识形态分歧远远没有结束，但分歧的背景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宗教、民族和种族的因素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每个文明和文化的群体都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发展轨迹，对自身的文化遗产做出认真的总结。

其次，中国地位重新上升的历史意义绝不可能仅仅限于单个国家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能力。用句时髦的话讲，中国已经面临不能不考虑“后赶超时期”的历史任务。她在经济上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中华文化传统的复兴，并对全人类今后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提供有益的价值观和思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大前提也绝不可能是全面接受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即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和发展观。中国有改造和纠正欧洲中心论的重大国际责任。

再次，同越南战争一样，这次在全球范围内启动的意识形态大辩论的契机是另一场全世界大多数人都反对的伊拉克战争。越南战争虽然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也遭到强烈的抵制，美国的决策者至少还能用遏制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论”来加以辩解，因为西方世界的大多数民众认同抵制苏联扩张的根本任务。小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则只有子虚乌有的借口：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实质是在推行“枪杆子里面出民主”的新型的政权变更政策（regime change）。这个政策在欧洲盟国的民众当中都毫无市场，更不用说在亚非拉和中东的广大地区。在越战中，欧洲民众对美国民主的性质和运作方式并没有提出根本意义上的质疑，伊战却促使欧洲民主国家的公民考虑美